

МОНГОЛ УЛСЫН ИХ СУРГУУЛЬ
ШИНЖЛЭХ УХААНЫ СУРГУУЛЬ
“МОНГОЛ СУДЛАЛ”

Эрдэм шинжилгээний сэтгүүл

Боть XLIX (622)

DOI: 10.22353/ms20254914

关于契丹文数词及天干¹

阿茹娜²

摘要：契丹文字是辽代契丹民族所创制的民族文字。数词与天干作为契丹语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契丹语言文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契丹文中的“一”至“十”基数词和天干作为重点，系统性梳理其契丹大、小字释读历程与音值构拟成果，对当前研究状况进行探讨。

关键词：契丹文 数词 天干

引 言

1922年6月，比利时神父凯尔温（L.Kervyn，汉名梅岭蕊）在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右旗的辽庆陵首次发现了用契丹小字刻成的兴宗皇帝及仁懿皇后哀册，这一发现为后续契丹文字研究提供了关键性实证材料，契丹小字研究始于此。三、四十年代，基本处于对一些契丹字字义的推测阶段。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焯等学者采用各种对比契丹文和汉文资料的方法，考释了一批汉语借词、年号、干支及官职名称，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重心转向契丹文字读音研究，以探索拼读法、构拟字音为主。上世纪七十年代，契丹文字研究小组主要以“利用已知字的音义，探求未知字的音义”的办法，进一步拓宽了释读范围，使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具有划时代意义。进入21世纪后，随着契丹文字原始资料的持续发现，研究者们得到了大量珍贵的研究素材，契丹文解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相较于小字，大字因表意性高、墓志资料稀缺，研究起步晚。1935年山下泰藏首次公布《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大字资料。1950年阎万章发表《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标志契丹大字解读工作正式开始，研究进入长期探索阶段。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主要研究大字与小字的区分，金光平和曾毅公明确区分庆陵式和锦西西孤山式契丹文字，为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此后因资料匮乏，国内大字研究停滞二十多年，1979年刘凤翥发表《关于混入契丹大字“乚”的读音》，标志研究重新活跃，研究活动和成果显著增长。21世纪起，随着新资料涌现和研究方法进步，契丹大字研究有新突破，

¹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发现辽朝后族碑铭解读与契丹小字拼读法研究”（21AYY023）的阶段成果。

² 阿茹娜，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2025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此阶段研究不仅限于词语解读，更进一步为一些大字构拟了音值。如今，随着碑刻资料出土和已释读语词增加，研究迈入新阶段，但语法规律尚待深入研究。

一、契丹文基数词

通过对比契丹文与汉文墓志铭文及历史资料，契丹文基数词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原始资料的积累，学界发现“一”至“十”基数词有两种小字形式，字形区别在于右上角有无加点。后来，进一步研究揭示，二者主要区别于“性”范畴，不带点原字修饰“阴性”词（兼指“阳性”），带点原字只修饰“阳性”词。研究期间，学界还广泛讨论了数词的读音，并陆续构拟了音值。

（一）基数词“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研究者通过墓志契、汉对照的方法释出小字𐰚、𐰚为“一”。关于其大字一，因直接借形汉字“一”，早期即获学界共识性解读。

关于契丹文“一”的读音，爱宕松男（1956）尝试以简化蒙古语读音来读，如把“一”读为nen。但此法任意性较大，未获学界赞同。即实（1986）参照字源“毛”，根据满语“一”[əmu]将𐰚拟音为[əmu]，𐰚拟音为[əmul]。清格尔泰（1997）通过“一”的序数词𐰚𐰚余的词干与基数词比较的方法，认为𐰚相当于𐰚𐰚，提出读音当为mas，此观点后于刘凤翥（2014）沿用于𐰚、𐰚二字。清格尔泰等（2017）根据𐰚与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第一”及𐰚与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余“第一”词干的对应，分别将𐰚拟音为əmu、𐰚拟音为əmu-s。

根据以往研究结果来看，契丹文中“一”的阳性词和阴性词的音值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具体为何等问题尚不明确，且在阿尔泰语系中未找到其相似读音。随后，吴英喆（2022）对𐰚的音值重新进行了构拟。他提出𐰚𐰚（𐰚𐰚）或𐰚𐰚为契丹文阳性基数词𐰚的分写式。此前，𐰚𐰚一直被即实释为“别”，并参照蒙古语之“别”ᠨᠥᠭᠦ，将其读作nögö。但吴英喆认为释为“一”比释为“别”更为合理，因此，重新构拟𐰚的音值为ne，此发音更接近蒙古语“一”ᠨᠢᠭᠡ nige，与其存在演化联系。吴英喆还提出，契丹文中的阳性和阴性基数词或为形、音皆不同的两个系统。据此发现，彭鞅如罕（2023）通过对比《道》的原刻和改刻内容，发现𐰚𐰚𐰚和𐰚𐰚𐰚（实为𐰚𐰚𐰚）相对应，认为𐰚𐰚（n-em）是𐰚的分写式，最终对阴性“一”𐰚重新构拟音值为nem。

包阿如那（2019）释读《贍》时，通过系统性研究阳性基数词，发现大字𐰚实为阳性“一”。

根据近百年研究成果可知，契丹文基数词“一”的大字为一，对应小字𐰚（𐰚𐰚），为阴性；𐰚对应𐰚（𐰚𐰚、𐰚𐰚、𐰚𐰚），为阳性。关于其拟音，学者们曾尝试诸多方法，进入二十年代后，吴英喆和彭鞅如罕利用𐰚、𐰚的分写式重新构拟了正确音值。

（二）基数词“二”

研究者们通过墓志契丹文对照汉文的方式早已释出小字𐰽、𐰽代表基数词“二”。其中𐰽为阴性，𐰽为阳性。李文信（1942）在《故》中成功释出大字为二，字形借于汉字“二”。

关于其读音，爱宕松男（1956）缩略蒙古语“二”hoyar的发音，将𐰽读为hya。苏联学者达斯金则截略蒙古语发音，提出[xo]的读法。即实（1986）认为𐰽的字源为“圣”（古音为[kʰug]），与蒙古语族语言进行比较后将𐰽拟音为[kʰoir]，𐰽拟音为[kʰojɔ:l]。清格尔泰（1997）根据序数词词干𐰽化（tj-ru），将𐰽拟音为[tʃur]，与古代蒙古语表示“二”的jir、jur词干相近。刘凤翥（2014）将𐰽、𐰽均拟音为[cəɾə]。其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阴性𐰽读作jir，而阳性𐰽读作hoyar。

刘凤翥在考释《祺》9时曾将大字𐰽释作“二个”。之后，包阿如那（2019）对其进行进一步论证后发现大字《祺》9与小字《兀》8中关于“磨鲁堇侍中二子”的记载相同，其中𐰽𐰽 𐰽对应𐰽𐰽 𐰽（孩子二），可知大字𐰽与𐰽对应，应释为“二”。

综上所述，契丹文基数词“二”的大字二对应𐰽，为阴性；大字𐰽对应𐰽，为阳性。目前学界对于数词“二”的读音还未形成共识。

（三）基数词“三”

契丹文研究初期，学者根据墓志契丹文和汉文对照方法释出𐰽、𐰽均表示基数词“三”。其中𐰽为阴性、𐰽为阳性。阎万章在释读《孝》时释出大字三为“三”。

关于读音，爱宕松男（1956）缩略蒙古语“三”gurban拟读为gan。即实（1986）认为字源为“勾匕”，并进一步推测字源音值与蒙古语[korpa]和达斡尔语[koʁab]的发音更为接近，故将𐰽拟作[kurpɔ]，𐰽拟作[kurpɔ:l]。从上述可看出，当时学界对于“三”的拟音一直无法确定。直到发现𐰽𐰽𐰽、𐰽𐰽𐰽、𐰽𐰽𐰽均表示序数词“第三”，且了解𐰽、𐰽为序数词词缀的情况下，最终得以推断出𐰽𐰽和𐰽等同于𐰽。基于以上发现，清格尔泰（1997）提出𐰽读音为ɣ，𐰽读音为ru，并按照元音和谐律读为yuru，因此确定𐰽的读音应为yur。清格尔泰等（2017）为𐰽假定性拟音yur-n?。然而，近些年来有学者对原字𐰽的读音提出不同意见，认为𐰽应读作ud，从而将𐰽读作yud。

刘凤翥最先指出大字内义为“三”，后来包阿如那（2019）在系统性研究阳性基数词时，指出该字为阳性大字。

综上所述，基数词“三”大字三对应小字𐰽，为阴性；大字内对应小字𐰽，为阳性。通过序数词词干𐰽𐰽构拟基数词𐰽的音值为yur，那么契丹语与蒙古语的“三”ᠭᠦᠷᠪᠠ（gurba）发音相似，二者或为同源词。但对于近些年来出现的𐰽读作ud的观点，也应给予关注，尚需进一步研究来验证。此外，虽然阴性𐰽的读音大致明确，但若根据上文所提出的契丹文基数词阴性和阳性得音值属于不同系统来看，那么阳性𐰽的读音仍旧是个待解之谜。

（四）基数词“四”

在研究早期阶段，学界便已发现小字𐰚、𐰚表示基数词“四”。其中𐰚为阴性，𐰚为阳性。刘凤翥在考释《孝》17时，根据纪年的推算释出大字𐰚义为“四”。

关于其读音，爱宕松男（1956）缩略蒙古语“四” ᠳᠤᠷᠪᠡᠨ /durben，拟音为den。即实（1986）根据达斡尔语“四”turpu，将𐰚读作[turpu]、𐰚读作[turpu:l]。直到小字资料中释出表示序数词“第四”的 ᠳᠤᠷᠤᠨᠠᠷ （du-ru-ar），又在了解契丹语序数词词根与基数词基本相同的基础上，清格尔泰（1997）提出应将𐰚拟音为dur。刘凤翥（2014）将𐰚、𐰚均拟音为[tərə]。清格尔泰等（2017）表示𐰚应读作du~dur，还为𐰚构假定性拟音dur-n?。

近年，包阿如那（2019）新释出大字𐰚为修饰“四”的阳性基数词，与小字𐰚对应。

综上可述，契丹文基数词“四”的大字𐰚对应小字𐰚，为阴性；大字𐰚对应𐰚，为阳性。关于“四”的阴性基数词 𐰚 的音值 dur，主要还是基于序数词词干所进行构拟。这与蒙古语“四” ᠳᠤᠷᠪᠡ durbe 的读音相近，二者或为同源词。契丹小字《迪》17中出现过 ᠳᠤᠨ （t-un）表示“四岁”，而且在蒙古语中称“四岁公牛”为 ᠳᠤᠨ dun，二者音近，这或许表明契丹语“四”在阿尔泰语系中或有词源依据。此外，阳性基数词𐰚的音值尚未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基数词“五”

契丹文基数词“五”的大字𐰚，李文信（1942）在解读《铭》时率先释出。郑绍宗（1973）在释读小字《仲》7时发现，数字𐰚 𐰚位于𐰚 𐰚（十八）之前，当时小字中只有“五”和“九”未释出，那么出现在𐰚（八）之前的小字𐰚只能是“五”。随着原始资料的累积，发现小字𐰚也表示基数词“五”。其中𐰚为阴性，𐰚为阳性。

关于其读音，国外研究者率先进行构拟。爱宕松男拟为te，达斯金拟为tau，山路广明拟为tao。然需注意的是，他们的拟音对象似乎并非基数词“五”，而是针对地支“卯”（ 卯 ）。《契丹小字研究》（1985）根据《辽史·国语解》中“五曰讨，兔曰陶里”的记载，将𐰚拟音为[tau]。即实（1986）基于此记载，再与蒙古语[tʰpʊ]和达斡尔语[tʰawʊ]进行比较后，最终将𐰚拟音为[tʰawʊ]、𐰚拟音为[tʰawʊ:l]。清格尔泰（1997）通过与序数词 ᠳᠤᠷᠤᠨᠠᠷ （tʰ-w-o-i）词干进行比较，提出读音应为tʰaw。刘凤翥（2014）将𐰚、𐰚均拟作[thau]。清格尔泰等（2017）为𐰚构假定性拟音tʰau-n?。

吴英喆等（2017）在释读契丹大字《準》时，推断第3行出现的 ᠳᠤᠷᠤᠨᠠᠷ 为修饰限定阳性词的数词“五”。

综上所述，契丹文基数词“五”的大字𐰚对应小字𐰚，为阴性；大字𐰚对应小字𐰚，为阳性。其音值为tʰau，可见契丹语中的基数词“五”与蒙古语“五”读音一致，这表明“五”可能是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的共同成分。此外，𐰚的音值有待进一步研究。

（六）基数词“六”

契丹文研究初期，学界通过契、汉对译法早已识得𐰃、𐰄指契丹文基数词“六”。其中𐰃为阴性，𐰄为阳性。最早有国外学者对其进行拟音，如爱宕松男（1956）截略蒙古语之“六”jirgugan的读音，拟音为ji；山路广明则根据满语读音，拟音为nungku。即实（1986）通过追溯字源“仄”的古音构拟，并参考蒙古语“六”[tʃirkoka]和达斡尔语“六”[tʃirkɔ:]的读音，将𐰃拟音为[tʃirkɔ]、𐰄拟音为[tʃirkɔ:l]。

阎万章（1988）在释读《袍》时根据墓志末行出现的纪年𐰃𐰃𐰃𐰃𐰃三月十𐰃日，结合汉文墓志记载的“大安六年三月十九日”，释出大字𐰃应指“六”。除此，“六”的大字在契丹文献中也曾出现过多种书写形式：《特》2作𐰃、《北》2作𐰃、《公》6作𐰃、《祺》2作𐰃。

清格尔泰（1997）参考女真语“十六”nixun，为𐰃假定性拟音nir?。清格尔泰等（2017）再进一步为𐰃构假定性拟音nir-n?。

包阿如那（2019）在释读《瞻》时发现大字“六”还有另一种写法，即𐰃𐰃，为阳性基数词。吉如何（2021）提出，根据大字𐰃𐰃的末尾字𐰃读作ya-a，认为将小字𐰃读作jirqo‘a~jirqo-a:的可能性更大，大字𐰃可以读作jirqo。

综上所述，可知契丹文基数词“六”的大字𐰃（𐰃、𐰃、𐰃、𐰃）对应𐰃，为阴性；𐰃𐰃则对应𐰄，为阳性。关于契丹文“六”的读音，学界众说纷纭，拟音差距较大，至今没有达成共识。

（七）基数词“七”

罗福成与王静如通过墓志契丹文与汉文对照法释出小字𐰃、𐰄为“七”。其中𐰃为阴性，𐰄为阳性。

关于基数词“七”的读音，学界存在多种观点。爱宕松男（1956）率先缩略蒙古语“七”dologan，拟音为doa。即实（1986）根据其字源“屠”的古音，并参考蒙古语口语“七”tolɔ和达斡尔语“七”[tolɔ:]的发音，将𐰃拟音为[tolɔ]、𐰄拟音为[tolɔ:l]。

刘凤翥（1993）考释《习》时，将第14行的纪年𐰃𐰃𐰃𐰃𐰃𐰃译译为“大安□年岁廿九”。后又根据汉文墓志所载墓主人卒于天庆三年（1113）享年五十一岁的信息，推算其出生年当为清宁九年（1063），进而得出二十九岁时正值大安七年之结论。因此，最终确定大字𐰃为数字“七”。

清格尔泰（1997）认为“第七”的词干为𐰃𐰃，已知𐰃音为t，与蒙古语和达斡尔语“七”的第一个字音相差不大，遂将𐰃假设音值为lo或lu，再按照元音和谐律，将𐰃𐰃最终拟音为tolo或tolu。刘凤翥（2014）将𐰃、𐰄均拟作[tilie]。

《再研究》（2017）根据清先生的拟读，认为单写的𐰃读为dol，为𐰃构假定性拟音dol-n?。

包阿如那（2019）释读《瞻》时发现大字“七”的另一种书写形式𐰃𐰃，为阳性基数词。吉如何（2021）在此基础上，根据已知𐰃对应小字𐰃𐰃（d-il）、大字𐰃对应小字𐰃（ɔ）的情况下，结合元音和谐律，将小字𐰃读音拟作d-ol-o。

综上所述，契丹文基数词“七”大字𐰽对应𐰽，为阴性；大字𐰽对应𐰽，为阳性。关于其读音，有 dol 或 dolo 的说法，但区别不大。由此可知，契丹文基数词“七”的读音与蒙古语的读音基本相同，“七”或为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的共同词汇。

（八）基数词“八”

基数词“八”小字𐰽和𐰽，学界通过墓志文契、汉对译法在早期研究阶段中成功破译。基数词“八”的大字𐰽，最初由丰田五郎释出，后来金永田在考释《习》时发现了大字“八”的另一种书写形式𐰽。

关于其读音，最先有爱宕松男（1956）根据蒙古语“八”的读音 naiman，缩略读为nman。即实（1986）举出其字源应为“乃土”，并基于蒙古语族中仅蒙古语与达斡尔语的“八”的发音naima与字源“乃土”的读音较接近，故将𐰽拟音为[naimo]、𐰽拟音为[naimo:l]，但未找到有力证据。吴英喆（2014）通过对照《蒲》、《详》和相关史料后发现𐰽对应伏𐰽𐰽（n-ie-m）。清格尔泰等（2017）将𐰽读作naim，为𐰽构假定性拟音naim-n？。

包阿如那（2019）新释出“八”的大字还有另一种书写形式，即𐰽，为阳性。

由此可知，契丹文基数词“八”的大字𐰽（𐰽）对应小字𐰽，为阴性；大字𐰽对应小字𐰽，为阳性。其读音为naim，可知契丹语“八”与蒙古语“八”读音一致，或为契丹语和蒙古语中的共同词汇。然而，对于阳性𐰽的音值，尽管有人为其构假定性拟音[naimo:l]和naim-n，但这些仅为假设，其音值尚待进一步研究。

（九）基数词“九”

郑绍宗（1973）在释读《仲》时，当时小字只有“五”和“九”尚未释读。在考释该墓志第7行时释出“五”的小字后，对于出现在第50行的新数词𐰽，认为必“九”无疑。

关于其读音，最早爱宕松男拟音为ri。《契丹小字研究》（1985）据《辽史·营卫志》记载的“赤寔得本为孝”，指出𐰽𐰽𐰽𐰽𐰽为“孝”，为其构拟音值为ʃ-i-is-d-p-n。可知𐰽拟音为is，这一拟音，在解读𐰽𐰽𐰽𐰽𐰽（孝）一词中得到验证。

阎万章（1988）在释读《袍》的末行纪年𐰽𐰽𐰽𐰽𐰽三月十𐰽日时，基于汉文墓志“大安六年三月十九日”的明确记载，并且在前文又准确释出𐰽为“六”的基础上，最终确认大字𐰽为“九”。

即实（1986）认为北方诸族语言之数词均无单音节词，故认为将𐰽读为isu较is更合理，同时也将𐰽拟音为isu:l。刘凤翥（2014）将𐰽、𐰽均拟音为[is/si]。清格尔泰等（2017）将𐰽拟音为is、为𐰽构假定性拟音isu-n？。

包阿如那（2019）在辨别官职名称时发现大字𐰽还表示“司”之意。

综上所述，契丹文基数词“九”大字𐰽对应小字𐰽，为阴性。对应阳性小

字𐰚的大字暂未发现，但鉴于上文提到的大多数词都存在阳性基数词大字看来，“九”或许也有阳性大字，有待研究。学界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对𐰚拟音为is达成共识。可见，契丹语“九”与蒙古语“九”读音一致，该词可能是契丹语和蒙古语的共同词汇，但阳性𐰚读音待研究。此外，根据包阿如那的发现，大字𐰚可能存在两种读音，表“九”读作is，表“司”读作si。

（十）基数词“十”

研究早期，学者们利用墓志契、汉对译的方法早已发现小字𐰚、𐰚表示基数词“十”。其中𐰚为阴性，𐰚为阳性。大字十由李文信（1942）释出，字形借汉字之“十”。

关于其读音，爱宕松男（1956）缩略蒙古语araban的读音，将𐰚拟音为aa。即实（1986）依据中古蒙古语“十”的读音 xarpa，将𐰚拟作 [xarpa]、𐰚拟作 [xarpo:l]。吴英喆等（2015）解读契丹小字《玦》时发现𐰚𐰚𐰚表示“第十”，已知“第三”𐰚𐰚𐰚的序数词后缀为𐰚𐰚，是可知𐰚𐰚的词根为𐰚。据清先生的研究了解到序数词的词干和基数词基本一致，故《再研究》（2017）认为𐰚的读音应与基数词𐰚一致，因此将𐰚、𐰚的读音均拟作 p'o-ap'o。

包阿如那（2019）在释读《贍》时推断十𐰚𐰚或为阳性基数词“十”，但是由于其他大字文献中尚不见该词组，故未能作有效解读。

综上所述，契丹文基数词“十”大字十对应小字𐰚，为阴性，对于阳性基数词十𐰚𐰚还需更多原始资料的出土进行佐证。关于其读音，《再研究》最终正确拟音为 p'o-ap'o。

二、契丹文天干

天干是较早释出的一批契丹文字。在契丹文中，多使用干支纪年，常与年号纪年组合出现，所以学者们或多或少最先把目光聚焦在那些纪年款上。在使用干支纪年法时，契丹文采用五个词分别表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组天干。有关契丹文天干的释义众说纷纭，迄今主要有“五行说”、“五色说”和“调和说”等说法。“五行说”主张用“木、火、土、金、水”表示五组天干，“五行说”则主张用“青、赤、黄、白、黑”来表示，“调和说”则主张用“黑（水）、赤（火）、白（金）、青（木）、黄（土）”来表示。目前学界倾向于“五色说”，并在越来越多原始资料中已被证实。

（一）甲乙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右，就有罗福成、王静如、厉鼎奎等老一辈学者们通过墓志文契、汉对比的办法，成功释出契丹小字“甲”和“乙”。例如，《仁》《道》《郎》中的“甲”均写作𐰚𐰚𐰚；《仲》中的“甲”写作𐰚𐰚𐰚；《宣》《故》里的“乙”均写作𐰚𐰚𐰚；《兴》中的“甲”“乙”均写作𐰚𐰚𐰚。契丹文以五色表示天干，则“甲”对应青色，这一点在《显》33中关于“青”的两个不同写法中均得到体现，即𐰚𐰚𐰚和𐰚𐰚𐰚。由此可知，契丹文之“甲

乙”有三种书写形式：𐰇𐰺𐰍、𐰇𐰺𐰍和𐰇𐰺𐰍。吴英喆基于参考带点与不带点的基数词的“性”差异，以及契丹语序数词后缀𐰺与𐰍、𐰺与𐰍的“性”差异，提出契丹文天干可分为“阴性”或“阳性”。据此，可判断𐰇𐰺𐰍、𐰇𐰺𐰍为“甲”（阳性），而𐰇𐰺𐰍则为“乙”（阴性）。吴英喆还指出，契丹语“阴性”天干可以兼指“阳性”，而“阳性”天干不能兼指“阴性”。

关于“甲乙”大字，阎万章（1957）在释读《孝》时利用与汉文墓志进行对比的方式释出“木龙年”𐰇𐰺𐰍，其中的𐰇即为“甲乙”大字。

关于其读音，主张“五色说”的山路广明拟音为 *singe*；即实拟音为 *siauk'æ*，随后基于《研究》已拟定的原字，参考满语之“黄”、女真语之“翠”的读音 *suwajan*，最终拟定读音为 *siau'æ*；王弘力读拟音为 *siaog*，词根参考了回鹘语 *səŋkə-ri*；乌拉熙春尝试拟音为 *sjaugu*、*saugu*。主张“五行说”的黄振华拟音为 *seseqereg*。主张“调和说”的爱宕松男拟音为 *alakar*。

综上可知，契丹文“甲乙”大字𐰇对应小字𐰇𐰺𐰍、𐰇𐰺𐰍、𐰇𐰺𐰍，其中小字存在“阴”“阳”之别。迄今为止，学界尚未确定“甲乙”的确切读音。参考《再研究》的原字拟音，𐰇音 *s*、𐰺音 *iau*、𐰍音 *au*，𐰺常与𐰍互换使用，均读作 *g~gə*，基于此尝试可拼读为 *siau'g~sau'g*。然而，不论采用何种拟音，“甲乙”读音在蒙古语族语言中均无相似读音，因此其词源至今未能明确，推测或为契丹本民族独特语词。

（二）丙丁

小字“丙”在研究初期阶段使用契、汉对照的方法所释出，有两种不同书写形式，在《兴》1中写作𐰇𐰺𐰍，《仁》28中则写作𐰇𐰺𐰍。契丹文中“丙”和“丁”用同一字符表示，在后续出土的原石资料中也曾多次出现“丁”，写作𐰇𐰺𐰍，但未曾见到𐰇𐰺𐰍。根据吴英喆（2014）研究成果可得知，阳性𐰇𐰺𐰍只表示“丙”，阴性𐰇𐰺𐰍则均可表示“丙”“丁”。关于“丙丁”之大字𐰇，阎万章等学者在研究早期阶段根据与墓志汉文对照，从而释出其义。由此可知，大字𐰇对应小字𐰇𐰺𐰍和𐰇𐰺𐰍。

关于“丙丁”的拟音问题，学界存在诸多分歧。主张“五色说”的山路广明将其拟作 *dungye*；即实拟音为 *liauæ*；王弘力根据《燕北录》记载“赤娘子者，番语谓之掠姑奥偈。”的基础上表示𐰇𐰺 *əliao*和𐰍/𐰺 *ə*之间应有 *g*，据此拟音为 *əliaogə*；乌拉熙春拟音为 *ljaugu*。主张“五行说”的黄振华读作 *geseqereg*。主张“调和说”的爱宕松男则拟作 *ulakan*。

从上述拟音可知，“丙丁”的契丹语读音在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其音值构拟存在明显差异。参考《再研究》原字拟音，如𐰇音 *l*、𐰺音 *iau*，𐰍和𐰺常常互换使用，均读 *g~ge*，最终可结合拼读为 *liau'g*。此读音与王弘力先生的拟音 *əliaogə* 较为相似，故其读音可能与“掠姑”存在关联。关于此拟音的进一步证据在于，《孝》2中出现的大字“𐰇𐰺”表示人名“烈虎”，可知在人名中“𐰇”的音为“烈”，与 *liau'g* 的首音相近，这或许可为其读音提供有力的佐证。

（三）戊己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学者们通过契、汉对译法，依据小字 **山**、**山** 所出现的语境进行推断，释义为“戊己”或“金”，**山** 和 **山** 在表示“戊己”或“金”时可交替使用。其中阳性 **山** 为“戊”，阴性 **山** 为“己”。关于其大字，刘凤翥等（2005）在考释《特》时，根据墓志主人的下葬日期，释出大字 **𐰺** 为“戊”。由此可知，大字 **𐰺** 对应小字 **山**、**山**。

对于“戊己”的音值，主张“五色说”的山路广明拟读为 jin；即实据《契丹国志》谓“地有二水……曰裊羅箇没里，复名女古没里者”，知裊羅箇一名是契丹人的称呼，应指“黄”，最终将 **山** 音为 niolko，后又改作 niolɔg；刘凤翥提出“戊己”语义为“黄”，读“女古”，构拟音值为 [rulugu]；王弘力认为 **山** 应义为“金”，以金代黄，读 xant，即《辽史》音译之“按达”ant、anta 系由蒙古语“阿里答”alt、alta 音变而成；乌拉熙春拟作 njolgo。主张“五行说”的黄振华认为“戊己”与“金”没有联系，应当配“土”，又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引宋绶《行程录》“契丹谓‘山曰纳都’”，认定 **山** 的读音为 nutug、又说 **山** 的读音为 dogo，后来改作 nuəttuo。主张“调和说”的爱宕松男拟作 ča。吴英喆提出 **公𐰺𐰺** 为 **山** 的分写式，均表示“大金国”的“金”，因此据“女古”的读音将 **公𐰺𐰺** 和 **山** 拟音为 nik 或 niku。

由上述各家拟音可知，对于契丹文“戊己”的发音，主张不同看法的学者们构拟了种种读音。对于即实的拟音，笔者认为 **山** 是否读作“裊羅箇”还有待进一步考究。王弘力将“按达”与“阿里答”联系起来将 **山** 读作 xant 的观点，虽有一定说服力，但缺乏直接证据支持。至于黄振华的拟音，笔者认为很难落实，尽管 nutug 的读音有“山曰纳都”的文献记载，但 **山** 与“山”、“土”、“家乡”之间除了字形，并无其他实际联系。吴英喆根据文献中出现的 **公𐰺𐰺**，通过对比两种不同写法的“金”，构拟音值为 nik 或 niku。笔者认为该法有文献依据性，也较为合理。此读音在蒙古语族语言中未找到相似读音，推测或为契丹本民族独特语词。

（四）庚辛

在二十世纪早期研究中，学界便已释出“庚辛”小字。如，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燧和郑绍宗等学者研究《道》和《宣》等等文献时陆续释读出契丹小字 **𐰺**、**𐰺** 为“庚辛”之义。关于其大字，金永田（1991）在考释《习》时，对照墓志汉文成功释出纪年部分的大字 **𐰺** 为“庚辛”。可知，契丹文“庚辛”大字 **𐰺** 对应小字 **𐰺**、**𐰺**。

关于“庚辛”的读音，主张“五色说”的山路广明认为 **𐰺** 应义为“白”，且与汉字“汞”相似，其本义应指“银”，故参考蒙古语之“银”的读音，将其拟音为 munggu；即实从字源“沓”出发，结合蒙古语“白”的读音，拟读 **𐰺** 为 t' ak'an、**𐰺** 为 t' ak'ag；乌拉熙春拟音为 talqu。主张“五行说”的黄振华将“庚辛”对应五行之“金”，又据蒙古语之“金”的读音，拟音为 ortu 或 oltu。主张“调和说”的爱宕松男则认为 **𐰺** 对应五行之“木”，其所尚之色为“青”，遂又参照蒙古语“青”的读音 huhe，构拟音值为 hu。

后来,陈晓伟(2011)为𠂔重新构拟了音值。他根据史籍《辽史·耶律良》之记载推测出耶律良之小名为𠂔“苏”,据此将𠂔拟读为su。而且耶律良又称耶律白,从而推知𠂔的契丹语本义为“白”。

据吉如何先生的观察,表示“别胥”的契丹小字通常使用𠂔𠂔𠂔,而在《智》21中则将其记作𠂔𠂔𠂔。这说明,𠂔𠂔为𠂔的分写式。已知𠂔𠂔读ts-iu或s-iu,因此,认为𠂔亦可读作siu~su。清格尔泰等(2017)为𠂔构假定性拟音siu-n?。

综上所述,陈晓伟之前的拟音工作,均基于“五色说”和“五行说”的预设之下,参照蒙古语的读音从而为𠂔、𠂔构拟的音值。但这些拟音成果均缺乏辽代文献作为依据,故很难令人信服。陈晓伟根据《辽史》记载,推知𠂔应拟音为su。吉如何根据𠂔的分写式将其拟音为siu~su。实际上,在蒙古语中,“牛奶”被读作sü,而牛奶恰好为白色。基于此,笔者推测,契丹语中的“白”可能与蒙古语的“牛奶”存在关联。

(五) 壬癸

关于“壬癸”小字,在契丹文文献中出现过五种书写形式。早期研究中最先释出𠂔𠂔为“壬”,之后罗福成在考释《道》时释出𠂔𠂔。刘凤翥在考释《清》15的𠂔𠂔𠂔𠂔时释义为“黑龙年”,该墓志刻于金世宗大定十五年,这里说的“黑龙年”即指壬辰年,也就是说𠂔𠂔义为“壬”。其他“壬癸”小字在《奴》3作𠂔𠂔、《兀》37作𠂔𠂔。关于大字,金永田(1991)在释读《习》时,发现第17行中出现的大字𠂔应意为“癸”。此外,刘凤翥等(2004)在考释《昌》20时,根据耶律昌允的下葬日期释出𠂔为“壬”。由此可知,大字𠂔、𠂔对应小字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和𠂔𠂔。其中,𠂔𠂔、𠂔𠂔和𠂔𠂔均为阳性、𠂔𠂔和𠂔𠂔均为阴性。

关于其读音,学界仍有较多争议。主张“五色说”的山路广明拟为saliga;即实读作jou;王弘力认为与蒙古语“炭黑”xuu相当,拟音为xuu;乌拉熙春拟为jogu或jogju。主张“五行说”的黄振华认为𠂔𠂔与五行之“水”相当,拟音为usiyiu。主张“调和说”的爱宕松男拟音为 dumda。

白玉柱(2006)构拟了𠂔𠂔的音值为 yalu,认为其义应为“黑”。此后,刘凤翥在释读“黑龙年”后,并根据有关汉字墓志最终构拟了𠂔𠂔的读音为[xr-u]。随后,陈晓伟(2011)构拟𠂔𠂔、𠂔𠂔与𠂔𠂔的音值为xər-u。

笔者根据《再研究》对原字的拟音:𠂔读 xar,𠂔读 u,𠂔读 iu,𠂔读 ir,𠂔读 mou~əm,可知𠂔𠂔读 xar-u,𠂔𠂔读 xar-iu,𠂔𠂔读 xar-ir,𠂔𠂔读 xar-iu,𠂔𠂔读 mou~emu。据观察,可发现除了𠂔𠂔读音较为特殊外,其他读音都较为接近,故推测“壬癸”可能读作xar-u或xar-iu。此发音与蒙古语之“黑”ᠬᠠᠷ xar较为接近,猜测与蒙古语或为同源词。

结论

本文对契丹文“一”至“十”基数词及天干等两个方面的词汇释读历程及音值构拟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梳理,现将所得出结论归纳如下:

一、数词方面

(一) 历经数代学者探索,契丹文“一”至“十”基数词的音值陆续得到构拟。除“五”“九”外,因研究的年代、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各家对其他数词的拟音成果均有一定差异。

(二) 契丹文数词存在阴性、阳性的语法范畴,部分学者在构拟音值时已进行区分。基本上所有阴性基数词音值已得到构拟。过去研究表明契丹文“一”至“十”数词的读音接近蒙古语族语言,通过对比各家对基数词的音值构拟,可发现契丹小字中的阴性基数词“二”“三”“四”“五”“七”“八”“九”的读音均与蒙古语族语言相近。

(三) 阳性基数词的音值,除“一”以外,其他均未被构拟。根据最阳性“一”nem和阴性“一”ne的音值构拟结果来看,小字中的阴性和阳性基数词不仅书写形式不同,音值也有所差距,这表明契丹文阳性基数词和阴性基数词或属两个不同系统。笔者大胆推测,其中一组基数词的音值接近蒙古语,另一组基数词可能是契丹本民族独特语词。

(四) 在阳性基数词大字中,“六”𐰽𐰺、“七”𐰽𐰺、“八”𐰽𐰺、“十”𐰽𐰺等三个数词均由两个大字组成,这样的表现形式较为特殊,仍待进一步探讨。

二、天干方面

天干的释读成果大多形成于契丹文字研究初期阶段,主要是依托契、汉对译法进行解读。由于学界长期存在天干“五行说”和“五色说”等两种理论分歧,不同学术阵营的拟音成果呈现显著差异。尽管许多字词的拟音、释义存在争议,但研究成果仍然提供了珍贵资料。经过多年研究,学术界已探明契丹文天干中“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的本义分别为“青”“赤”“黄”“白”“黑”。其中,“甲乙”读音为siau'g~sau'g,但在蒙古语族语言中未找到相似读音,推测或为契丹本民族独特语词。“丙丁”拟音为 liau'g,推测可能与“赤”(掠姑)或有渊源。“戊己”𐰽𐰺、𐰽𐰺的读音为 nik或niku,与“女古”读音相似,因在蒙古语族语言中未找到相似读音,推测或为契丹本民族独特语词。“庚辛”阳性𐰽𐰺拟音为 siu~su,𐰽𐰺拟音为su,与蒙古语“牛奶”sü 的读音相近,或有渊源。“壬癸”的读音则明显接近于蒙古语中的“黑”xar,猜测与蒙古语或为同源词。值得注意的是,契丹文“天干”同样存在“性”差异。

注释

一、契丹大字文献简称与全称：

1. 《铭》 《故太师铭石记》
2. 《孝》 《萧孝忠墓志》
3. 《北》 《北大王墓志》
4. 《袍》 《故北宰相萧公墓志铭》
5. 《习》 《大横帐节度副使墓志》
6. 《公》 《故永宁郡公主墓志铭》
7. 《昌》 《耶律昌允墓志》
8. 《祺》 《耶律祺墓志铭》
9. 《準》 《大辽国常袞耶律準墓志铭》
10. 《袍》 《萧袍鲁墓志铭》
11. 《贍》 《维南贍部洲大辽国铭》
12. 《特》 《耶律特免郎君墓志碑》

二、契丹小字文献简称与全称：

1. 《兴》 《兴宗皇帝哀册》
2. 《仁》 《仁懿皇后哀册》
3. 《郎》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
4. 《道》 《道宗皇帝哀册》册文
5. 《宣》 《宣懿皇后哀册文》册文
6. 《仲》 《越国王萧仲恭墓志铭》
7. 《许》 《辽国许王墓志》
8. 《故》 《故耶律氏铭石》
9. 《迪》 《耶律（韩）迪烈太保墓志铭》
10. 《兀》 《耶律兀没副署墓志铭》
11. 《详》 《耶律奴详稳墓志铭》
12. 《显》 《显武将军拔里公墓志铭》
13. 《蒲》 《耶律蒲速里太傅墓志碑铭》
14. 《玦》 《耶律玦敞稳墓志铭》
15. 《清》 《萧太山将军永清郡主墓志》
16. 《智》 《耶律智先太尉墓志铭》

参考文献

- 刘凤翥. (2014). 契丹文字研究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清格尔泰, 刘凤翥, 陈乃雄, 邢复礼. (1985). 契丹小字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 (2017). 契丹小字再研究.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 (2004). 契丹語文字の研究. 《東亞歷史文化研究會》, 5, 67-68.
- 爱宕松男. (1956). 契丹Kitai文字の解説について. 《東北大学文学研究年報》, 7.
- 即实. (1986). 关于契丹数词音读问题.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89-100.
- 清格尔泰. (1997).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 《内蒙古大学学报》, 4, 1-9.
- 吴英喆. (2022). 契丹文基数词“一”音值考. 《民族语文》, 3, 116-122.
- 李文信. (1982). 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 《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 3, 49-53.
- 刘凤翥. (2006). 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考释. 《内蒙古文物考古》, 1, 52-78.
- 彭鞅茹罕. (2023). 契丹小字阴性基数词“一”的音值构拟. 第五届蒙古语族语言国际研讨会上宣读, 乌兰巴托, 蒙古.
- 包阿如那. (2021). 新发现契丹大字《维南瞻部洲大辽国铭》研究. 内蒙古大学.
- 阎万章. (1957). 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 《考古学报》, 2, 69-84.
- 郑绍宗. (1973). 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 《考古学报》, 5, 300-309.
- Wu Yingzhe, Jiruhe, Daruhan Peng. (2017). Interpretation of the Epitaph of Changgun Yelü Zhun of Great Liao in Khitan Large Script.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 217-251.
- 阎万章. (1988). 契丹文《萧袍鲁墓志铭》考释. 《民族语文》, 03, 25-28.
- 刘凤翥. (2017). 若干契丹大字的解读及其它. 《辽金历史与考古》, 1, 272-285.
- 丰田五郎. (1984). 契丹大字の日付について. 《京都産業大学国際言語科学研究所紀要》, 6.
- 金永田. (1991). 契丹大字“耶律习涅墓志”考释. 《考古》, 4, 372-379.
- 吴英喆, 孙伟祥. (2015). 契丹文皇族“第十帐”及其他.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 131-135.
- 吴英喆. (2014). 再论契丹文天干阴阳之别. 《北方文化研究(韩国)》, 12, 57-64.
- 即实. (1982). 契丹小字字源举隅. 《民族语文》, 3, 54-60.
- 刘凤翥. (2005). 契丹大字《多罗里本郎君墓志铭》考释. 《民族语文》, 5, 50-56.
- 即实. (1984). 解_山及其他. 《民族语文》, 2, 56-60.
- 山路广明. (1956). 契丹製字の研究. 《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研究室刊行(東京)》.
- 王弘力. (1986). 契丹小字墓志研究. 《民族语文》, 4, 56-70.
- 即实. (1982). 关于_山, _山二字.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Z1, 158-163.
- 刘凤翥. (1983). 契丹小字_山, _山的解读及其他. 《宋辽金史研究》.
- 黄振华. (1981). 契丹文“_山”, “_山”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 《社会科学战线》, 2, 326-333.

- 吴英喆. (2004). 关于契丹小字中的“大金国”的“金”.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6, 113-116.
- 陈晓伟. (2011). 再论契丹“五色纪年说”——以契丹小字𐰺为中心. 《文史》, 4, 175-184.
- 吴英喆. (2014). 关于若干契丹原字的读音. 《阿尔泰学报(韩国)》, 6, 129-134.
- 即实. (1986). 关于契丹小字的几个问题. 《民族语文》, 3, 66-68.
- 刘凤翥, 王云龙. (2004). 契丹大字《耶律昌允墓志铭》之研究. 《燕京学报》, 17, 61-99.
- 吉如何. (2021). 契丹大字音义举隅. 《民族语文》, 4, 92-100.
- 黄振华. (1985). 契丹文天干名称考. 《考古与文物》, 4, 93-95.
- 宝玉柱. (2006). 契丹小字𐰺及其替换字研究. 《内蒙古大学学报》, 1, 8-12.

Abstract

The Khitan script, created by the Khitan people during the Liao Dynasty, is a distinctive writing system. As crucial components of the Khitan language, its numerals and Heavenly Stems hold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languag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numerals “one” to “ten” in Khitan script and the Heavenly Stems, systematically tracing their evolution from large to small character interpretations and phonetic value reconstructions. It also examines current research developments in this field.

Key words: Khitan Script; numerals; Heavenly Stems